

全球视域下的国际关系

朱瀛泉 主编

英国与 欧安会的起源 1968—1975

申红果 著

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
全球冷战进入了相对缓和期，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成为这个进程中东西方关系的一个重大事件。

本书以英国外交档案材料为依据，

比较完整地探讨了英国在欧安会起源问题上的战略及政策。

英国一贯追求东西方“正常外交”的方针以及对苏联东欧推行“和平演变”的政策，

在围绕欧安会的谈判中暴露无遗。

这表明，欧安会无法从本质上改变冷战的性质，

而只是冷战的另一个战场。



南京大学出版社

全球视域下的国际关系

朱瀛泉 主编



英国与 欧安会的起源

1968—1975

申红果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与欧安会的起源:1968—1975 / 申红果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3

(全球视域下的国际关系 / 朱瀛泉主编)

ISBN 978 - 7 - 305 - 05745 - 8

I . 英… II . 申… III . ①欧安会(1975)一研究②外交
史一研究—英国—1968—1975 IV . D814.1 D856.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4728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版人 左 健

丛 书 名 全球视域下的国际关系/朱瀛泉主编
书 名 英国与欧安会的起源(1968—1975)
作 者 申红果
责任编辑 王 慧 编辑热线 025 - 83592123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市溧水秦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35 × 965 1/16 印张 26.25 字数 416 千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5745 - 8
定 价 52.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4756
电子邮箱 sales@press.nju.edu.cn(销售部)
nupress1@public1.ptt.js.cn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序

朱瀛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研究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理论上的多样化以及互为渗透的综合化趋势,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个学科以前由少数主流学派统驭的局面。研究的内容和视野得到空前的拓展,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一些传统概念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面对全球化发展对人类社会生活之影响的日益彰显,国际关系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把他们所从事的学科领域称之为“世界政治”或“全球政治”,而不再满意于过去的“国际政治”。18世纪晚期英国哲学家边沁当初创造的“international”这个词,反映的是他所处时代欧洲国家间政治的现实,即由建立在领土疆界上的民族国家之间关系构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今200多年后,还继续用原来对国际体系的认识框架来解读这个跨国性和全球性的世界,显然不相适应了,尽管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这种认知的变化源于时代的变迁。全球化是一个恢宏和漫长的历史进程,但它的当代表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昭示了全球性与国际关系研究这个学科的关联意义。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全球视域对于促进国际关系学科的知识进步是必不可少的,无论对于审视历史上国际关系的演变,还是认识当今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的变化与趋势,都是如此。这也是本丛书题名为“全球视域下的国际关系”的初衷。

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伴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而生长发展,是我

国人文社会科学中同国家战略目标与和平发展有紧密联系的一个重要学术领域。过去的 30 年间,我国这个领域知识共同体的学术自觉有了显著的提高,一是增强了把国际关系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建设的意识,二是致力于建立学术研究与国际关系实践中新问题、新趋势的联系。这些努力使我们这个学科的发展保持了应有的活力。而随着中国在全球政治和经济事务中影响力提升以及与外部世界交融的日趨密切,我们的学科建设处在了一个新的历史坐标上,创建我国国际关系理论和知识体系已成为学术界共同的愿景。我们知道,世界政治是一个连续性和可变性并存的社会世界,国际关系研究的任务不仅要说明国际体系是怎样变化而且要说明应该怎样变化,因而它是一门有关人类社会实践与命运、具有规范性研究特性的学科。美英等西方国家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时间比较长,基础理论发达,其中有不少值得我们在学理上认真学习借鉴的成果,但他们的研究特别是主流理论,主要是根据西方经验及其对现代历史的理解构建起来的,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或思想判断上的偏颇。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正在和平崛起中的发展中国家,并以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作为理论思维的指导,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化之路不能重蹈西方的老路,它完全有可能建立在将中国经验和世界经验结合并以此来理解世界政治的基础上,以使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知识体系的建设适应时代发展的规范要求。任何的学术进步和理论创新只有在扬弃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也惟有循此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探索,才会实现共同的愿景。

这套丛书系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依托国家 985 工程南京大学“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而组织筹划,并作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十一五”规划重点图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从 2009 年起陆续出版。这套丛书的出版,既受惠于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之优良学统的浸润,更得惠于丛书作者们之激奋于时代和国家

发展的感召。该丛书的意旨在以全球视域为基点，结合有关国际关系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着重探索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丛书内容丰富，包括国际关系思想和理论、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和全球治理、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主体性、20世纪以来的国际史、全球国际体系和地区体系，大国外交和战略等方面的专业研究，涵盖了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历史和现状三大方面的领域。我们希望，这套综合性国际问题研究丛书的出版，将对促进我国国际关系研究学术事业有所帮助。是所望焉，谨此序。

2008年10月于南京

目 录

总 序	i
绪 论.....	001
第一章 冷战“缓和”与欧安会倡议的历史过程	024
第一节 冷战“缓和”走向高潮	026
第二节 苏东国家欧安会倡议的历程.....	040
第三节 西方设置欧安会“先决条件”	058
第二章 英国对各国欧安会目标的剖析和认识.....	066
第一节 英国对苏东国家欧安会目标的剖析.....	066
第二节 对西方、中立-不结盟国家欧安会态度的认识.....	080
第三章 英国欧安会政策的形成.....	087
第一节 英国对欧安会的态度:始终怀疑,但准备充分.....	087
第二节 英国的欧安会战略和策略.....	104
第四章 英国与欧安会重大议题.....	151
第一节 充实“第一只篮子”	156
第二节 紧抓“第三只篮子”	217
第三节 英国与欧安会“后续”议题	257
第五章 欧安会起源与英国的对外关系.....	290
第一节 难以“解冻”的英苏关系	291
第二节 积极融入欧洲政治合作.....	316

第三节 欧美框架内的英美关系	343
结 论	360
后 记	377
附件 欧安会的组织结构	379
主要参考文献	381
索 引	392

绪 论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是当前研究的热点,但是很多研究却忽视了其前身——“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简称“欧安会”)。关注时间较短、研究成果有限,是目前欧安会起源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而其中英国与欧安会的关系更是少有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欧安会是冷战国际史的重大事件,既是冷战斗争的敌对状态的具体体现,又表明冷战被迫走向缓和、从而换了一个战场。欧安会被视为“缓和的高潮”,对它的研究是对冷战国际史研究的重要补充。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欧安会也曾经被故意歪曲,比如,1970年代《人民日报》把欧安会称为“欧危会”,有的研究者把欧安会视为“慕尼黑阴谋的重演”^①,对欧安会、苏联的批判言辞激烈。这显然和当时的中苏冲突有关,也和中国不了解欧安会的具体情况有关。

召开欧安会最早是苏联在1954年的柏林会议上提出的倡议^②。苏联希望签订“全欧安全条约”,并就此问题召开一次全欧会议。当时,苏联想借该条约阻止西德重新武装并加入北约组织,可是这个目的没有实现。此后,苏联不仅没有放弃欧安会倡议,甚至把欧安会作为其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当缓和走向高潮的时候,苏联领导人在多个场合均提出欧安会具有重大意义。1960年代中后期以后,欧安会倡

① 《人民日报》1973—1977年各期;汪宏玉,徐正:“欧安会是慕尼黑阴谋的重演”,《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75年第4期。

② 具体来说,召开全欧会议的建议是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提出的,当时遭到英国、法国的强烈反对。

议改由华约组织继续发出。与此同时,欧安会倡议融入了东欧国家的某些诸如“国家主权平等”的诉求。西方国家对欧安会倡议的回应主要是通过北约组织。另一方面,苏联也曾经和某些西方国家单独交流欧安会问题。随着北约逐步调整战略以及缓和的继续发展,北约由怀疑欧安会倡议到逐步接受,并和华约组织进行了多次交流。但是,北约提出了不同于苏联方面的建议,有些建议表明两大集团处于尖锐对立状态。北约提出必须解决西柏林的地位并以之为欧安会的前提条件。当美、英、法和苏联签订“柏林四国协定”及其议定书以后,召开欧安会的最后一道障碍消除了。欧安会与会国除了欧洲国家外,还包括美国、加拿大,总共三十五个。

本研究以全球视域下的英国与欧安会的关系作为考察对象,目的是深入探讨欧安会起源时期英国和欧安会的关系、特别是英国的欧安会政策和作用特点,以及欧安会背后以英国为核心的的大国关系。英国从反对缓和、对苏东的欧安会倡议抱严重怀疑态度,到逐渐接受缓和、同意召开欧安会,并在会议期间以团结西方、维护西方集团的整体利益为己任,在西方集团内发挥重要的穿梭协调作用,其政策前后发生了很大转变。那么,英国何以会接受欧安会?英国的态度是如何转变的?它对欧安会采取了哪些政策、有何调整?这种调整背后的动因是什么?英国在欧安会期间发挥了哪些作用?英国和其他西方大国以及苏东国家的关系在欧安会期间发生了怎样的演变?英国和欧安会互相有何影响?本书选择英国和欧安会的关系这个研究视角,主要想体现以下几方面意义:

第一,从欧安会的召开探讨缓和高潮时期冷战斗争的某些特征,特别是英国对缓和态度的演变,总结英国缓和政策的特点。冷战形势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欧安会能否召开。欧安会的举行是在缓和逐渐走向高潮的时刻,这次会议本身也被视为缓和的高潮、“缓和之子”,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冷战时期东-西方关系的转折。可以说,欧安会研究充实了冷战国际史研究。特别有意义的是,通过对英国和欧安会关系的考察,可以展现英国对缓和的态度及其缓和政策的演变。当东-西方关系和美苏关系渐趋缓和的时候,英国和法国、西德完全不同,它没有积极参与其中,反而心存疑虑,但另一方面,英国又不得不置身其中,因为英国希望避免落在其他西方盟国后面。因此,欧安会的召开突出体现

了英国对缓和的态度及政策,英国不得不接受缓和,尽管这种转变是不情愿的。

第二,通过考察英国和欧安会的关系揭示英国的欧安会政策。英国最初并不想要欧安会,只是为了在缓和进程中和法国、西德等保持同步,才认同欧安会。英国始终认为欧安会不是自己想要的,却又不可避免。当英国认识到欧安会不可避免后,它进行了相当充分的准备,包括战略和策略以及欧安会相关谈判议项等。因此,可以说英国对欧安会的态度和政策存在很大矛盾。

第三,探讨英国在欧安会问题及欧安会谈判过程中的独特作用。简单地讲,西方集团确定接受欧安会以后,法国在某种程度上游离于北约之外,西德的根本利益(如东部边界和柏林问题)是欧安会上的争论焦点,而美国始终对欧安会不感兴趣,这就使得上述三个国家不可能在欧安会问题上起领导作用,这给英国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团结和协调西方盟国的重任落到了英国身上。英国也相当主动地担当起维护西方团结的任务,通过欧洲政治合作(也称“戴维农机制”)和北约合作两条途径不断协调西方国家的立场,从而在欧安会谈判过程中给苏联和东欧制造很大压力,维护了西方集团的利益。在某些问题的谈判中,英国甚至领导着西方。当然,英国不可能取代美国在西方集团中的地位,也不可能使西方各国的观点完全一致,但英国的确在欧洲实现了大国地位,这是它非常渴望得到的。

第四,探讨欧安会背景下英国和苏联、美国以及欧洲大国的关系。欧安会召开的时间,恰好是英国面对冷战新形势需要调整其对外政策的重要阶段。英国即将正式加入欧洲共同体;和美国的关系也不再是紧密的“特殊关系”,而是即将后退到“自然关系”。面对苏联这个已经崛起的军事大国,面对苏联的缓和攻势,英国充满疑虑,并且长时间未能和苏联建立良好的双边关系。那么,英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在欧安会期间呈现何种状态,发展如何?本书将对此做出回答。

第五,通过对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考察,本研究还可以使读者深入理解欧安组织的机制及其现状,并揭示“合作安全”观念及理论的起源、特征等,体现出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本书以 1968 年到 1975 年为考察时段,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原因:一,1968 年(特别是 8 月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之后)是苏联东欧国家发起

欧安会倡议的第二次高潮的开始。苏联率领华约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暂时中断了欧安会倡议,但并没有终止欧安会倡议。半年以后,华约和北约甚至逐步进入更加频繁的交流阶段。1968—1975年这个时期是欧安会设想从积极倡议到成熟、由不可能到正式举行的时期,集中体现了其变化过程与基本特征。二,这一时期内,西方国家从怀疑到逐步接受欧安会倡议,其间经历了重大而复杂的变化。作为西方集团一员的英国,它对欧安会的种种态度,自然受西方集团和国际政治大气候的影响,因此,这个时段最能体现英国对欧安会的态度及其政策之演变。三,这一时期最能体现英国在欧安会问题以及会议过程中的作用,最能体现英国和欧安会的关系。本研究所选定的时段覆盖了欧安会从协商到召开,从开始筹备到会议结束的时间,为探讨英国在欧安会上的作用(包括英国的欧安会政策)提供了基础,能集中体现英国和欧安会起源的关系。因此,1968年至1975年是本书最关注的时段,也是最能体现本书宗旨的时段。

二

对于英国和欧安会的关系,有些研究者已经做了一些探讨,取得了一些成果。从总体看,这些研究散见于前人对欧安会的研究之中,研究视角主要是考察英国对欧安会的态度,而不是以英国和欧安会的关系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它们要么把英国放在西方集团里做总体考察,要么仅对英国的欧安会态度做粗略介绍。至于专门以英国和欧安会的关系为研究对象,鲜有成果,更未见有专著^①。无可讳言,英国和欧安会的关系始终没有被视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课题。现有研究或因为立场问题而有所偏颇^②,或因为时间和材料方面的局限而难以厘清事实真相。事实上,欧安会研究也存在这个不足。时至今日,虽然有不少研究者把

-
- ① 英国人菲利浦·威廉姆斯(Philip Williams)写了一篇英国和欧安会的关系的论文,该论文的写作时间是1980年代中期,它截取的时间段较长,对英国和欧安会的关系考察得比较简略。见 Philip Williams, 'Britain, détente and the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in Dyson, Kenneth (ed.). (1986). *European Détente: Case Studies of the Politics of East-West Relations*. London: Frances Pinter (Publishers), pp. 221—236.
- ② 如南斯拉夫研究者阿西莫维奇(Ljubivoje Acimovic)比较强调南斯拉夫在欧安会上的作用。可是,根据英国的档案文件材料显示,南斯拉夫有时在制造麻烦。

目光投向欧安组织及其相关问题,可是对欧安会起源认识不足,使该领域的研究留有不少遗憾。

下文将以英国和欧安会的关系之研究为主线,总结迄今为止相关研究之基本状况。

首先,英国与冷战“缓和”的研究。“缓和”一般被分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缓和与东-西方缓和。对缓和的研究是比较充分、比较深入的。

1. 关于美苏缓和:研究者在美苏缓和的原因方面上有较多共识,理查德·克洛卡特(Richard Crockatt)在其《五十年战争》中归纳了西方学者对缓和原因的看法,即某些关键条件迫使美苏在有限的领域里相互适应,这些条件包括:1969年苏联取得对美国的核均势,两大集团内部独立倾向的上升,美国经济强国地位的相对衰落,美国集团领袖地位迅速受到限制^①。诺塞芝(F. S. Northedge)指出古巴导弹危机是促使美苏缓和的重要原因,他还认为苏联和中国的冲突是导致苏联采取缓和战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②。克洛卡特所归纳的上述因素,基本和我国学者的观点相符合^③。同时,中国学者更重视第三世界的兴起对缓和的影响。

虽然缓和已经出现,但是美苏两国不仅在长时间内都没有形成明确的“缓和概念”,甚至没有直接使用“缓和”这个词,而且两国对缓和的理解从一开始就不同^④。美苏“缓和”战略分歧非常明显,“缓和”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哲学意义。美国的缓和政策“并没有远离原先的遏

^① Crockatt, Richard (1995). *The Fifty Years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World Politics, 1941–1991*.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 203.

^② Northedge, F. S. (1974). *Descent from Power: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45–1973*.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p. 263.

^③ 参见王绳祖总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九卷(1960—1969)、第十卷(1970—197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1996年版;刘金质:《冷战史》(三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84—646页;黄正柏:《美苏冷战争霸史》,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0—204,237页。

^④ Garthoff, Raymond L. (1994). *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 American-Soviet Relations from Nixon to Reagan*. Washington, D. C. :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p. 27, 32; 刘金质:《冷战史》,第666页;Crockatt, *The Fifty Years War*, p. 219.

制共产主义这一优先政策”^①。尼克松和基辛格把缓和看作一个战略和手段,而不是目标,美国想利用缓和阻止核战争的爆发以及抵制苏联实力的上升^②。利特瓦克认为过渡性是尼克松主义非常明显的特征^③。斯帕尼尔指出,美国的缓和战略存在两个方面,一是同中国的缓和,二是同苏联的缓和,而且同中国的缓和更重要,美中缓和会鼓励美苏缓和^④。对苏联而言,与美国战略对等是缓和的坚实基础,特别是核武器威慑能力,而防止核战争、维护苏联安全成为缓和的战略目标和具体目标。苏联非常重视取得对美对等地位,以此为基础寻求除了军事缓和以外的政治缓和,即“力量的相互关系”(correlation of forces),尽管这很困难^⑤。苏联缓和战略既有合作又有竞争,一方面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教训,二是因为国家意识形态,因此在阶级斗争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方面,苏联坚持有所作为。加特霍夫认为苏联的“和平共处”是真诚的,不是欺骗西方,但这其中又包含有很强的竞争因素^⑥。但瓦日芒则认为苏联的伎俩使得西方相信“和平本身就是目的”^⑦。许多批评缓和的西方学者和政治领袖都认为缓和实际上是“有选择的缓和”,使得苏联在获得好处的同时损害美国的利益^⑧。

关于美苏缓和的本质,研究者都认为缓和没有取代冷战斗争,而是对峙与谈判的混合,区别仅在于二者混合的程度;缓和是遏制的补充,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核战争的替代物;两国互相约束,其本质是敌对性的^⑨。利特瓦克认为,缓和并没有使两个超级大国放弃谋求单边优势

① Crockatt, *The Fifty Years War*, p. 222.

② Garthoff, *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 pp. 32—33.

③ Litwak, Robert S. (1984). *Détente and the Nixon Doctrin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ursuit of Stability, 1969—197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91—196.

④ (美)J. 斯帕尼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段若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49页。

⑤ Garthoff, *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 pp. 41, 48—49, 59—73.

⑥ Garthoff, *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 pp. 41—52, 54.

⑦ (法)巴特里克·瓦日芒:《缓和的幻想》,丁世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9页。

⑧ 斯帕尼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第260页。

⑨ 斯帕尼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第242页;黄正柏:《美苏冷战争霸史》,第237页;刘金质:《冷战史》,第667—695页;Crockatt, *The Fifty Years War*, p. 204;(美)哈里·盖尔曼:“缓和的兴衰”,《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5年第3期。

的努力,美国口头上赞同刚刚出现的多极化,但实际政策却是恢复两极格局,这构成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困境^①。有的研究者批判缓和是假相。阿什顿(S. R. Ashton)说“缓和的基础是一些错误的前提和不当的概念”^②。瓦日芒则提醒人们不要被缓和的表象所蒙蔽,缓和不过是虚假的;缓和是被莫斯科用来为其“策略”目的服务的;苏联自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和西方签订的条约和协定并不能表明其意图的纯正;西欧受到许多威胁,如苏联在中欧加强军事力量等,不应该阻止欧洲人共同思考采纳能够保障他们最大安全的手段^③。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认为,缓和同战争一样都是可以选择的。绝大部分西方学者对苏联的缓和政策持敌视批判态度。针对很多人认为美国在缓和当中回报太少、而让苏联得到的太多这一观点,他分析认为,美国并没有失去那么多,而苏联也没有获得什么优势^④。

2. 关于东-西方缓和:研究者都注意到东-西方缓和在冷战缓和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与美苏缓和相比,欧洲缓和的基础更坚固,成就更大,关注的范围更广^⑤。克洛卡特还认为,欧洲缓和与美苏缓和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当欧洲缓和的确在向前展望时(如西德与东方集团改善关系),其实质却是回顾性的(retrospective),从而欧洲缓和把欧洲内部关系的形式变成了与欧洲实际历史相符合的了。在这一点上,陈乐民也认为,欧洲缓和是东-西方关系缓和的第一个表现,其目的就是打破二战后东、西欧由于冷战而互相封闭的局面。他还强调,缓和在意识形态上具有进攻性,即带有对苏联和东欧促变的意义^⑥。

① Litwak, *Détente and the Nixon Doctrine*, pp. 191–196.

② Ashton, S. R. (1989). *In Search of Détente: The Politics of East-West Relations since 1945*.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p. 130.

③ 《人民日报》,1977年8月8号第六版:“给‘缓和’幻想者敲警钟”;瓦日芒:《缓和的幻想》。

④ Richard Rosecrance. “*Détente or Entente?*” *Foreign Affairs*, Vol. 53, No. 3 (April 1975), pp. 464–497.

⑤ Garthoff, *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 p. 140; Crockatt, *The Fifty Years War*, p. 230; Jain, Rajendra K. (1993). *Germany,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1949–1991*. 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s, p. 139.

⑥ Crockatt, *The Fifty Years War*, p. 230;陈乐民:“西欧安全论”,《西欧研究》1987年第2期。

3. 英国与缓和。英国在缓和中的地位比较特殊,它既希望成为美苏缓和的有力筹码,又无法实现这个目标,它还不希望被排除在东-西方缓和之外。关于英国与缓和的研究,散见于美苏关系、东-西方缓和,以及英国对外政策等相关研究^①。

研究者们大多认为英国对缓和的态度是消极的,完全不同于法国和西德对缓和的态度。菲利普·威廉姆斯认为,东-西方缓和“大多源于巴黎,发展于波恩,并促使美国制定自己的缓和政策”^②。研究者普遍注意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缓和走向高潮的过程中,英国是被“边缘化”的^③。威廉姆斯认为,英国“既没有阻止缓和,也没有促进它”,它是缓和的接受者而不是创造者;从总体上看,英国对缓和的态度很保守,对苏联的防范之心非常强,所以它“对缓和的主要期望具有局限性”。肖恩·格林武德(Sean Greenwood)也认为英国的态度非常保守,比较“小心谨慎”,甚至是“呆板的”^④。

也有研究者积极评价英国对缓和的态度。巴克认为,1960年代英国保守党政府和工党政府都对苏联东欧国家采取了积极态度,尽管重点有所不同^⑤。怀特认为,英国对缓和的态度是支持的,不仅在美苏缓和实践中起了一定作用,而且对西德的新“东方政策”、特别是柏林问题也是支持的、并发挥了作用。英国各届政府自二战后以来也许从来没有关闭与东方谈判的大门,英国曾以“正常外交”或“谈判外交”作为缓和指导思想。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开始对缓和进程产生矛盾心

-
- ① 例如 White, Brian (1992). *Britain, Détente and Changing East-West Relations*. Routledge; Northedge, F. S., *Descent from Power: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45 – 1973*; Frankel, Joseph (1975).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45 – 197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ones, Roy E. (1974).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London; New York: Longman.
- ② Philip Williams, ‘Britain, détente and the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in Dyson, Kenneth (ed.). (1986). *European Détente: Case Studies of the Politics of East-West Relations*. London: Frances Pinter (Publishers), p. 225.
- ③ Northedge, *Descent from Power*, p. 265; White, *Britain, Détente and Changing East-West Relations*, p. 135; Philip Williams, ‘Britain, détente and the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in Dyson, *European Détente*, p. 225.
- ④ Greenwood, Sean. F. (2000). *Britain and the Cold War, 1945 – 91*. Macmillan Press LTD., ST. Martin's PRESS, INC, p. 175.
- ⑤ Barker, Elisabeth (1971). *Britain in a divided Europe 1945 – 1970*.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pp. 263 – 270.

理和怀疑主义^①。约翰·W·扬(John W. Young)在其著作里指出,英国对缓和不是消极的,英国从丘吉尔开始就倡议为减少欧洲紧张关系而努力,1964—70年间,威尔逊工党政府也提倡缓和。只是英国始终在西方联盟框架内寻求缓和,它的效果比法国等来得慢一些、晚一些,但确实是有结果的,而且比法国取得的结果要好^②。

关于英国对缓和采取消极态度的原因,格林武德分析,主要是由于英国不愿其独立核威慑战略被美苏缓和所破坏,而且1960年代英国经济发展迟滞,英国对苏联缓和意图保持怀疑,希望得到美国核保护伞和军事力量的保护,这些因素导致英国不愿意积极面对缓和。怀特的观点与格林武德部分相同,但怀特更强调由于美苏双边谈判而导致英国更加关注安全和防务,以及由于西德的新“东方政策”带来的国际政治结构性变化对英国国际影响力的削弱,这使得英国对缓和“又爱又恨”,“甚至怀疑缓和进程”,而这种怀疑最后集中在了欧安会这一事件上。此外,怀特认为,英国在1960年代末1970年初调整目标,把扩大东-西方的人道联系作为缓和的新层面,这对英国日后的缓和政策有很大影响,也是英国在欧安会上希望迫使苏联在人权方面让步的原因。英国各届政府都有自己的缓和政策,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缓和除了包括政治对话外,还应包括东西方社会的接触、提高欧洲东部人们的“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二战后英国就一直推行这一缓和政策,只是各届政府的重点有时会有所不同^③。诺塞芝从三个方面分析了英国未能在冷战缓和中扮演领头角色的原因:一是由于苏伊士运河事件的消极影响,使执政的威尔逊政府对欧洲事务缺乏兴趣;二是受英国工党政府(即威尔逊政府——笔者)全球范围对外政策的观念的影响,英国的兴趣被吸引到了东南亚及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上;三是由于英国各届政府都感到脱离美国而与“共

^① White, *Britain, Détente and Changing East-West Relations*, pp. 66 – 67, 123, 124, 126, 131.

^② Young, John W., (2003). *The Labour Governments 1964 – 70 (Volume 2): International polic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pp. 115 – 136.

^③ Greenwood, *Britain and the Cold War, 1945 – 91*, pp. 179 – 180; White, *Britain, Détente and Changing East-West Relations*, pp. 115 – 133, 165.